

學術期刊生態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秦開鳳

[提 要] 知識體系是學科體系產生的文化土壤和根基,學科體系是知識體系邏輯分類和系統化的成果,學術期刊是知識體系學科化的集中展示。學術期刊不僅是知識的交流傳播平台,而且是原創性知識生長的“苗圃”。期刊生態反映並形塑著知識體系,良好的期刊生態是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要素。建設有利於原創性知識生長的期刊生態,似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優化期刊群結構,發揮綜合性期刊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勢;強化與學術共同體的聯繫,回歸“編研一體”運作機制;弱化期刊評價功能,阻斷產生浮躁學風的動因;實化“內容為王”的理念,反對盲目照搬自然科學“學術規範”的形式主義傾向。期刊生態本質上是文化生態,只有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覺,堅定開放包容的文化自信,才能突破西方強勢文化的裹挾,打造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關鍵詞] 期刊生態 知識體系 學科體系 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118 - 11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①作為知識生產和學術交流平台的學術期刊,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中應當發揮重要作用。縱觀我國學術期刊整體發展現狀,近年來確已獲得了長足進步,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例,表現出總體規模趨於穩定、新創期刊特色鮮明、發展機遇持續向好、主題策劃成果豐富、行業研究不斷深入等特點,^②對推動我國哲學社科學術的繁榮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需要直面的是,學術期刊仍存在許多發展的不足或瓶頸,比如清華大學仲偉民和溫方方就總結梳理出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綜合性與專業性的矛盾、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影響越來越大、“三審三校”的外在要求與主編編輯的能動作用如何協調、匿名評審制如何適應中國的學術環境、編輯工作的重要性與編輯身份的尷尬、紙本期刊在數字化時代的困境,等等。^③這些問題直接制約了期刊的高質量發展,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在加快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背景下,本文嘗試從“期刊生態”整體視角探討學術期刊與知識體系的互構關係及其如何服務和作用於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這一宏偉工程。生態,指生

* 本文係陝西省宣傳思想文化系統“六個一批”人才項目“期刊生態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階段性成果。

物在土壤、氣候等一定自然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期刊生態則是指學術期刊群的整體生存發展狀態及其內外環境,包括期刊數量、質量、結構、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等。學術期刊依托於學科專業,學科體系與知識體系緊密相關。探討期刊生態,首先有必要釐清知識體系、學科體系及其與學術期刊之間的關係。

一、知識體系與學科體系的異同

(一) 知識體系是學科體系的文化土壤和根基

知識指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認識和經驗的總和;學術、文化或學問。學科指按照學問的性質而劃分的門類,如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學校教學的科目,如語文、數學;軍事訓練或體育訓練中的各種知識性的科目(區別於術科)。^④由此可見,知識體系是人類在一定時間空間對世界認知總和歸納建構的內容系統,學科體系則是人類認知分類的外在表現形式和表達方式。蔡曙山指出,“人類知識體系是人類憑借心智和認知能力建構的。人類憑借語言和思維能力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活動進行認知,並逐漸建構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哲學和宗教的知識體系。……人類早期的知識是沒有學科分類的”。^⑤

考察人類文明史,人類從動物界脫穎而出,就是因為人能夠積累經驗掌握知識。知識體系伴隨人類誕生而進化發展。知識、知識體系的形成與歷史地理等因素緊密相關,並且處於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知識源自於經驗,又高於經驗。僅僅是個人或少數特定人群的經驗總結和認知尚不足以構成“知識”,須是具有普適性的經驗並得到普遍性的認可才能稱其為“知識”。這裡的“普適性”是指應用層面,是就知識的產生過程和表達方式而言,知識和知識體系必然帶有民族和地域色彩,會烙上時代的印記。因此,可以將人類知識體系區分為地方性知識和普遍性知識,可以討論某一民族擁有的知識體系特色。知識體系有時也可指個人的知識結構,如我們說某人“知識體系有缺陷”或某人“知識比較全面”等。有時學術界也存在知識體系與理論體系相等同的情況,對此並不嚴格加以區分。

(二) 學科體系是知識體系的邏輯分類和系統化

學科體系是知識體系的邏輯分類,是知識體系的系統化,是知識體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學科體系的形成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當人類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就會產生分類的需求。古代不同民族、族群對於自己發現和擁有的知識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歸類,但總體上並沒有科學標準和鮮明的邏輯體系。直到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之後開啟了科學革命,從哲學和宗教中衍生出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數學等自然科學。17世紀以來誕生了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再進一步發展到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學科相繼出現。進入20世紀,這種源自西方的學科分類體系在不斷分化、交叉、融合中逐漸為不同國家所不斷完善和認同。因此,現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是基於科學分類的邏輯體系。雖然其分類標準的形成和大多數主幹學科都起源於西方國家,但已經為全人類所共有,不可能為某一國家或民族所壟斷。

當然,由於學科體系的形成伴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化和教育傳承,不同國家也會根據自己的國情設置學科體系。如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將學科劃分為自然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即“理、工、農、醫、文”這5大門類,各大門類下設若干一級學科,一級學科下再細分為若干二級學科(專業),進一

步還可劃分為若干研究方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將學科劃分為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和交叉學科 14 大門類,並進一步細分為一級學科和專業學位類別。後者頒布的標準是為招生和授予學位方便對國標大門類的細化調整。前後兩種劃分標準實際上相互完全覆蓋,沒有本質的不同。從世界範圍看,不同國家的學科體系設置雖可能在完善程度和側重點上有所差別,但總體上大同小異。也就是說,學科體系是全人類達成共識的知識分類體系,具有普適性。

知識是人類認知的總和,學科則是知識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分類。知識的產生和發展要早於學科,一般意義上人類“知識體系”的內涵也要遠大於“學科體系”。儘管現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已很宏大,涵蓋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眾多門類,每一學科門類還可進一步細分為更多的次級學科和分支,但仍然達不到對人類知識的“全覆蓋”。反過來,人類知識體系則可以涵蓋既有的全部學科,除此之外,還包括大量不能或難以納入學科體系的地方性個性化知識。

(三) 知識體系帶有地域色彩,學科體系具有普遍意義

知識體系必然帶有地域色彩,學科體系應當具有普遍意義。“知識體系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基礎和凝練。”^⑥如果把知識體系比喻為一棵“知識樹”,學科體系只是樹幹以上的分支,而知識體系則是包括樹幹、樹根甚至土壤在內的整棵大樹。或者,知識體系可以理解為學科體系的內容、母體、文化土壤,學科體系則是其外在表現形式。知識體系作為一個動態演進、不斷發展的體系,就表現在學科體系的不斷細分、交叉和融合。

“知識”總是和“文化”相連,“學科”則是知識的科學分類。漢語表達我們常說“文化知識”,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知識體系”應屬“文化”範疇;漢語中“學科”恰是“科學”二字倒置,從詞源學意義上形象而貼切地表達了“學科”與“科學”的關聯,可以理解為“學科體系”更偏向於“科學”範疇。因此,我們通常是在“文化”意義上討論知識體系建設,在“科學”框架內探討學科體系問題。

基於知識體系屬於文化範疇的判斷,不難得出簡單的推論:自主知識體系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知識體系,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儘管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起源於西方,但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積累和知識體系的形成,必然建立在自身的歷史之上,有著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尤其是中國作為擁有 5,000 多年悠久歷史、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文明沒有中斷且延續至今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不可想象的。何為自主?“所謂自主的知識體系,就是中國擁有其知識產權且成體系的知識,是可以分享的源於中國而屬於人類的知識譜系。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根基是獨立自主、連續不斷、苟日新日日新的中華文明。”^⑦

二、期刊生態與知識體系的互構

(一) 學術期刊是知識體系學科化的產物

從知識發生學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對知識的探究和積累的歷史。隨著人類文明進步,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對知識的探究積累活動從最初的極少數人憑興趣愛好,“業餘”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狀態,逐漸發展成為社會公認的專門化職業,並擁有了與之相應的組織形式、研究機構、培養體系、圖書報刊等多種類型的學術交流平臺,以及與之配套的成果評價、職稱晉升、科學獎勵體系等,成為一種社會機制、國家體制。隨著時代發展,這種科學研究學術活動的體制化越來越精密,而在此變遷過程中,學術期刊也逐漸走向規模化和專業化。可以說,學術期刊就是知識體系學科化、學科體系體制化的產物。

學術期刊是學術研究最新成果展示發布的基本平台,也是開展學術研討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早期學術期刊實際是從科學家之間通信交流而衍生,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專業期刊名為《××通訊》。隨著科學研究活動的體制化,誕生了由專業學術組織主辦的學術期刊。近代史上最早的自然科學學術組織是1560年在意大利成立的“自然秘密研究會”。1662年英國國王查理二世批准成立了以促進自然知識為宗旨的皇家學會,隨之在歐洲歷史上湧現出近200個類似於英國皇家學會的學術組織。這些學術組織研究哲學與科學技術,同時學會之間也有著頻繁的學術討論交流。在這種情況下,僅靠信函進行學術交流已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而作為發布學術成果的載體,定期結集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學術通信及書刊信息的期刊開始出現。1665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機關刊物《皇家學會哲學學報》由學會秘書奧爾登堡獨自出版。^⑧《哲學學報》最初是以學會匯刊的形式編印,從1887年起開始分為A輯、B輯出版,分別刊載數學、物理學、生物學領域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學術期刊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加快。

學術期刊逐步分化的過程,本質上反映出知識體系走向分科、學科體系開始形成的過程。1778年,在英國出版的《化學會志》是世界上第一種專業期刊;1807年,德國專門刊載礦物學研究成果的期刊《礦物學雜誌》面世;隨後英國人先後於1823年、1830年創辦了醫學專業期刊《柳葉刀》和生物學期刊《動物學雜誌》;法國人於1830年創辦地質學專業期刊《法國地質學會通報》。與此同時,一些綜合性期刊開始出現母刊帶子刊、母刊之下再分輯出版多種專業性期刊的局面。隨著學術期刊品種與數量的急劇增多,人們逐漸缺乏時間和精力閱讀全文,而文摘類學術期刊由此應運而生。1830年德國人創辦了世界上第一種文摘刊物《化學文摘》,隨後美國人分別在1884年、1907年創刊了《工程索引》和《化學文摘》。20世紀60年代以來,計算機檢索技術的出現使人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速度查閱所需最新學術信息,進一步推動了檢索類期刊的創辦與發展。^⑨在學科體系的形成、傳播與交流過程中,世界各大國都逐步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學術期刊群,學術期刊成為科學研究過程的重要環節,成為學術共同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不同語言的學術期刊促進著學術交流傳播和繁榮,推動著學科體系不斷發展和完善。

近代以來,人類知識體系以分科為基礎,已發展成較為成熟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三大知識類型,相應地三大類別學科群分別形成了對應專業的學術期刊群。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發表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往往標識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學技術前沿水平;而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整體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高度。

一般而言,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應是高度國際化的學術交流展示平台。由於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於西方,且迄今自然科學多數領域西方國家仍居於前沿地位,掌握著學科標準制定和學術話語權,因此自然科學領域的各分支學科在幾百年發展中形成全球科學共同體公認的、代表該學科發展前沿、引領發展方向的大多數頂級期刊還是西方國家主辦的英語期刊。雖然中文、日文、俄文等自然科學學術期刊也正在迎頭追趕,並在不少專業形成特色。但是,如果我們對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期刊生態”的關注必須著眼於全球,那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生態圈”的討論還是應當偏重於本國範圍內。

(二)我國學術期刊生態與本土知識體系生長不完全適應

學術期刊是學科體系的伴生物,而學科體系誕生於西方知識體系。中國學術期刊出現的早期正逢亂世,但對推進當時學術和學科體系的形成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朱劍認為“關於中國最早的學術期刊,學界有不同說法,但最早的幾本學術期刊和大學學報產生於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則

是沒有問題的。……晚清到民初是中國現代學術產生的重要時期，中國現代學科體系的形成，得益於主要源自西方的大學教育和現代學術研究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學術期刊特別是大學學報發揮了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當時其宗旨和形式的選擇既是由大學及其所設學科發展的階段所決定的，也受到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人文學科，情況更複雜一些。”^⑩整體來看，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早期，只是零星的萌芽，遠未成“群”，也沒有形成具有一定規模或成熟結構的體系。

中國學術期刊成體系發展的新格局始於 20 世紀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一度中斷，改革開放後直到 21 世紀初的 20 多年時間，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迅速擴張，學術期刊也進入到一個大規模高速發展的時期。據統計，2020 年，全國共出版期刊 10,192 種，其中，哲學社會科學期刊共有 2,688 種，文化、教育類期刊共 1,401 種，文學、藝術類期刊共 661 種，自然科學、技術類期刊共 5,088 種，綜合類期刊共 354 種。^⑪而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認定的學術期刊有 6,430 種。綜合來看，我國學術期刊數量眾多、種類齊全，覆蓋了各門類學科，基本能夠反映我國學科體系的發展狀況。

但如果從供需結構看，我國學術期刊的總量遠遠不能滿足學術界論文發表的“剛需”，“供”遠大於“求”，極不平衡。許多行業都有發表論文的需求，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高校教師、科研人員和博士研究生群體構成論文發表的主體。據統計，2010~2021 年，中國高校專任教師、碩士和博士生招生數由 188.13 萬人增長至 306.17 萬人，增幅達 62.75%。^⑫因職稱評審或學業畢業發文要求等因素，發表文章的客觀需求不斷增長，但國內中文學術期刊總量多年來大致保持平穩，數量上的不匹配使供需矛盾愈加突出。

另外，近年來出現的大量中文核心期刊發文量持續減少的現象也值得重視，有研究者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統計得出，全部期刊載文量在 2014~2020 年明顯下降，最低的 2020 年比最高的 2014 年下降了 16.24%，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9.4%。北大核心期刊載文量從 2010 年開始呈現明顯下降趨勢，論文數量最低的 2019 年比最高的 2010 年下降了 29.95%。^⑬在論文發表供需極不平衡的背景下，為什麼發文需求增加而實際發文量反而減少呢？原因一方面在於論文篇幅越來越長，另一方面在於在當前評價體系的導引下，越來越多中國學者傾向於選擇將論文發表在國外期刊，這使中外文期刊的發表比例已經呈現出顯著的反差變化。據《2022 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論文數量世界排名繼續保持在第 2 位，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數量排名保持在第 1 位。由此可見，國際大型出版集團對中國學者的論文稿件已形成巨大的發表“虹吸效應”。這種現狀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學術期刊群存在著與本土知識體系生長不相適應或不完全適應的問題。

（三）良好期刊生態是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因素

知識體系是“無形”的，學術期刊是“有形”的。一方面學術期刊是知識體系、學科體系的反映，另一方面學術期刊也在形塑著學科體系、知識體系。西方知識體系學科化的過程產生了學術期刊，學科化的結果也使得西方知識體系成為普遍性知識體系的標準。而原生態的中國知識體系始終未能自發學科化，中國學術期刊群可以說是整體引進移植的產物，在現實中，我國學術期刊群與本土知識體系生長並不相適應，這不是單一或少數學術期刊的問題，而是有意無意照搬照套西方學術期刊發展模式，跟在後面學習模仿亦步亦趨，致使“期刊生態”欠佳。

可以看到，作為知識體系學科化的產物，西方學術期刊發展歷程走過了一條“綜合性——專業化——體系化”的道路。從最早出現的包羅萬象的綜合性“雜誌”，到越分越細的專業性“學報”，發

展到今天形成學科門類齊全、梯次等級明顯、文摘檢索方便的體系化、規模化、集團化、國際化學術期刊群。當今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團擁有高達 220 種以上的期刊,其他大型出版集團期刊數量也達到 60~80 種左右,美國出版 3 種以上期刊的出版集團有 500 多家,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學術期刊一般隸屬於專業出版集團。^⑩其中四大國際權威學術期刊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愛思唯爾(Elsevier)、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威立(Wiley)幾乎壟斷了學術出版行業,其旗下頂級刊物已佔據世界學術期刊制高點,具有難以撼動的地位。

反觀我國學術期刊的興起和發展歷程,相對於西方學術期刊群具有明顯的後發、移植特點。學術期刊的發展依附於學科體系的建設,我國目前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可以說基本上是舶來品。20 世紀五十年代初創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大量模仿和照搬了蘇聯體制,1979 年以來的學科體系建設則帶有濃厚的歐美國家的痕跡。這種體系結構及分類雖然自有其邏輯性、科學性,但與中國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並不完全契合,中國歷史上一些“冷門絕學”也未能有機融入該結構體系。王立勝認為:“中國過去的知識體系,按照現代的語言看是一種分類學的方法,最早是‘六藝’,後來衍化成了‘經史子集’,不是分科,而是分類,這個分類本身還保持了它的整體性。而西方的知識體系是分科,在古代的時候西方就有分科的傳統。……我們現在分布在中國各個高校裡面的這種學科,越分越細。這種學科的碎片化肢解了知識體系的整體性。”^⑪

誕生於自身知識體系土壤的西方學術期刊群,形成了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期刊生態,進而鞏固了西方期刊群的話語霸權和知識體系的壟斷地位。這表明良好的期刊生態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和關鍵,同時它也應當是期刊群與本土知識生產緊密聯繫、相互適應、良性互動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大環境。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迫切需要打造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群的優良“生態”。

三、良好學術期刊生態的建構路徑

(一) 優化期刊群結構,營造有利於原創性知識生產的大環境

打造良好的學術期刊生態,首先有必要從指導思想或辦刊理念層面明確兩個問題: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功能定位,究竟是論文的“傳播媒介”,還是知識的“生產平台”?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群結構優化的方向,重心是發展“綜合性”還是“專業性”?

一般來說,學術期刊的功能既是學術傳播交流的平台,又是學術創新、知識記錄的載體,二者兼而有之並不矛盾。但無論是管理體制還是辦刊理念,我們思想深處更多是把學術期刊只當作學術“傳媒”。管理體制行業歸口於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部門,運作機制上追求的是傳播效果,即發行量、點擊率、影響力等。主導思想潛意識層面是把學術期刊看作知識的“搬運工”傳播平台,而不是“生產車間”、“苗圃園地”。“自主”知識體系首先是來自自身實踐經驗的原創性知識的積累,良好的期刊生態首先應當有利於原創性知識生長。因此,學術期刊首先是知識的“生產平台”,其次才是“傳播媒介”。不能只是在口頭口號上強調創新發展,必須把如何促進催生原創性知識生長放在首位或更加重要的位置。

前面提及,西方學術期刊群具有高度專業化的傳統,也就是說其整體結構是以細緻分科的專業性學術期刊為主體,多學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相對較少。這種期刊生態的形成與西方知識體系發展脈絡一脈相承、高度一致,學術期刊彰顯並不斷強化著自身知識體系的主導地位。而我國學術期刊作為舶來品一開始就是大學辦刊,到今天更是國家體制,“單位”辦刊。因此形成了以多學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為主體的格局,當然也有不少專業學術期刊,但通常是不嚴格細分的“大專業”。

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發展到今天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知識體系學科化的過程首先是分化，學科越分越細才使得研究在一個專門領域越來越深入。知識體系學科化意味著人類知識生產進入到一個“學科性學術”時代。雲南大學何明歸納了“學科性學術”的三大特點：疆域化、範式化和建制化。^⑩專業學術期刊本身就是嚴格劃定知識的疆域界限、遵循學科專業的方法範式的知識生產傳播體制建制。這種建制在我國引入並運作到今天，在促進學科體系發展完善的同時，也表現出原創性知識增長乏力、學術“內卷”的傾向。2021年底《開放時代》雜誌以《從“學科性學術”到“問題性學術”》為主題舉辦了第十九屆開放時代論壇，大聲呼籲：擺脫“學科性學術”的束縛，扎根中國大地，直面前沿問題，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倡導“學科性學術”轉向“問題性學術”，應是探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之道的題中應有之義。^⑪

期刊界同人深感學界來稿多囿於“學科性學術”而乏於“問題性學術”，很大程度上可能與我們過度強調學術期刊專業化有關。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大多數主幹學科都已成熟，在單一學科領域有所發現和創新越來越困難，事實上大多學科都只能容納極少數頂尖學者在前沿開拓耕耘。而新知識的生長點和增長點，絕大多數是在學科交叉的綜合性領域。因此，學術期刊群以綜合性為主的特點更有利於新知識生長，也與我國整體性思維的知識傳統相契合，或許這正是我們期刊生態的“後發優勢”所在。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當前期刊界、學術界存在一種我國期刊去綜合化、強專業性的倡導意見，該意見已被國家重要的相關政策吸納，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發了《關於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中宣發〔2021〕17號），《意見》中在“優化布局結構”中強調，“原則上不再新批多學科綜合性學報。著力解決內容同質化問題，支持現有學術期刊合理調整辦刊定位，鼓勵多學科綜合性學報向專業化期刊轉型，突出優勢領域，做精專業內容，辦好特色專欄，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⑫當前，綜合性學術期刊確實存在“千刊一面”的同質化發展問題，但解決的思路不應是導向專業化，而更應該倡導綜合性學術期刊立足自身期刊歷史和優勢，結合時代，遵循學術發展規律，注重選題和策劃為引領的內容建設，走特色化辦刊之路。如果一味強化專業性、弱化綜合性，其結果很可能是跟在西方學術期刊發展模式後面亦步亦趨，客觀上並不有利於原創性知識的生產和自主知識體系的形成。

（二）強化與學術共同體聯繫，回歸“編研一體”運作機制

西方學術期刊高度專業化的格局伴隨著學科分化的歷史而形成。學術期刊主辦者從一開始的科學家及學術組織，再發展到後來由大型出版集團直接運作的國際化辦刊模式，其遍布全球的審稿人隊伍大都是各學科領域前沿的學術帶頭人，通過他們可以吸收頂尖學者們的高水平論文，搶佔各學科的學術制高點，進而確立自己期刊在該學科的主導和壟斷地位。更重要的是，審稿人制度使學術期刊始終保持與學術共同體的緊密聯繫，並成為學術共同體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學術共同體”亦稱“科學共同體”，是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的重要概念，它不是一個嚴密的界限，沒有清晰的組織機構，而是指基於某學科受過相同的方法訓練、具有共同的價值理念和範式認同、從事同一領域專業研究形成的結構鬆散的學者群體。“它是由學者以專業為基礎自願結成的眾多學術團體、學術期刊和學術會議組合而成的。專業性與自律性是這種學術共同體最突出的特點。”^⑬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學科發展相輔相成，而學科發展離不開作為交流聚合平台的學術期刊。從理論上講，學術期刊是相應學術共同體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中心環節。學術期刊編輯與科學研究一體化，即所謂“編研一體”，才可能形成有利於知識生長、學科發展的良好生態。

然而,我國的學術期刊雖然在形式上似乎依托於某學術組織(共同體),但在很大程度上游離於學術共同體之外。其原因在於,我國學術期刊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辦刊單位制”和“編輯職業化”。而科學研究與學術期刊往往分屬兩個不同系統,期刊的“學術編輯”可能具有該學科的學歷背景,但極少有處於學科前沿的“一線”學者具體從事編輯工作。而“單位”創辦的多學科綜合性學術期刊,其編輯的學科專業背景要求更容易被淡化,“編輯學”、“傳播學”、“圖書情報學”的背景可能更受歡迎。這種情況下,期刊與學術共同體“若即若離”、“貌合神離”,很難跟蹤到學術前沿,導致學術期刊缺乏國際競爭力,公信力和話語權弱化乃至喪失。

西方學術期刊擁有強勢話語權、代表和主導了西方知識體系的發展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堅持和保留“編研一體”的傳統制度設計。學術期刊在我國屬學習引進的產物,我們依據我國學科體系建設和發展的需求較好地移植了學術期刊的形式,但未能實施好“編研一體”的體制機制。管辦分離、編研疏離雖然有歷史的原因,但這種期刊運作機制對於原創性知識生長和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卻弊大於利。

因此,建立良好期刊生態需要從根本上回歸編研一體的制度設計。長遠來看,要把學術期刊交給科學共同體、學術組織來負責日常運營,政府加強行業監管,激發競爭活力。短期地看,要切實做到編輯學術化。學術期刊的責任編輯不同於普通責任編輯只要求文字功夫的編輯能力“過關”,還必須具備與專業背景相關的較高學歷和職稱,至少應當是“學術圈內人”,與學術共同體聯繫緊密,能夠敏銳洞察和捕捉到學科專業前沿動態。

實際上,我國不少專業學術期刊的主編都是一流學者,期刊編委會也由居於專業領域前沿的權威專家組成。應當從制度上有效解決期刊主編“掛名”、“缺位”等問題,重視和真正發揮期刊編委會的作用。強化期刊主編終審責任制,嚴格執行“三審三校”制,把握好論文稿件外審與內審的關係,加強匿名評審環節,聘請一流外審專家,嚴格資質篩選,並根據匿名評審專家履職情況動態調整專家庫。提升編輯專業素養,使編輯有能力參與到期刊的“知識生產”活動中來。

(三) 弱化期刊評價功能,阻斷產生浮躁學風的動因

如果說學術期刊游離於學術共同體之外不利於學術創新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那麼學術期刊高踞於學術共同體之上,更可能是造成學風浮躁、虛假盛行的重要原因。我國學術期刊不僅是學術交流傳播的平台,而且還“肩負”學術評價的使命。在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量化評價體系中,無論是學位評定、職稱晉升,還是成果獎勵、人才稱號等,都與論文發表的數量以及期刊的級別直接相關。

我國學術期刊管理一直延續傳統的審批制、主管主辦制、行業管理制和屬地制等層級管理。嚴格的審批制度使得學術期刊刊號“一號難求”,既難以出生,也缺乏退出機制,成為高度壟斷的行業。而以刊評文、以刊評人的學術評價現狀一定程度推高了部分期刊的“崇高”地位。由於論文供給遠大於期刊容量,不少核心期刊的自然來稿發表率只有幾十分之一甚至百裡挑一。21世紀初就出現一些季刊、雙月刊紛紛改月刊、半月刊的熱潮,以及買賣版面、違規增刊、頁數增多、假刊牟利、粗製濫造等期刊亂象。進入新時代,這些亂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並未消除其根源。不難看到,仍有期刊以營利為目的買賣版面,編輯專業水平極低,付費即可發表,導致“負面期刊”概念成為部分“學術期刊”的標籤。2018至2019年間,部分高校制定了“負面清單期刊目錄”,對本校師生論文的發表方向起到了警示和引導作用。除了這幾十種被列入“黑名單”的期刊之外,仍然存在不少雖未被點名但實則質量低下的平庸期刊。

期刊亂象背後反映的是影響更為深遠的學術亂象。以發表論文數量作為重要指標的學術評價，導致競爭異常激烈的發表環境。論文寫作不再是長期經驗積累和理論錘煉的研究和思辨成果，不再是出於學術熱愛的成果展現，而是“為發表而發表”的急就拼湊，其為滿足畢業要求、升學、找工作或評職稱等外在因素成為文章發表的主要動因，這種功利性的學術追求與學術求真的本質要求越來越遠離，也導致很難產生真正具有原創性和思想性的學術成果。

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的量化評價基本上是採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以影響因子作為主要評價指標，並將學術期刊劃分為“頂級期刊”、“權威期刊”、“核心期刊”、“來源期刊”、“一般期刊”等種類。顯然，這裡評價的本質是期刊影響力，而不是論文原創性或創新性。甚至連真正的影響力都算不上，因為這種被引用可能只是反映某個或大或小的“圈子”對此話題感興趣程度而已。科學史和人類知識體系的發展歷程一再表明，能夠帶來知識增長的重大科學發現和理論創新一開始往往並不為公眾所了解，即使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也鮮有認同，更談不上影響力。像愛因斯坦早在瑞士伯爾尼專利局工作的1905年在德國《物理學年鑑》上連續發表5篇論文，提出了相對論的基本原理。但在當時除了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加以肯定外，在學界幾乎沒有任何反響。1907年愛因斯坦提交得到普朗克讚揚的論文申請聯邦工業大學編外講師職位，但結果因“論文無法理解”而被拒。直到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帶領遠征隊經反復核對觀測到遙遠的星光掠過太陽表面會發生1.7秒的偏轉後，英國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正式宣布：廣義相對論的預言被精準證實！相對論成為物理學史和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愛因斯坦也由此名聲大噪，轟動世界。由此可見，在西方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對知識創新和學術水平的評價是基於學術共同體的同儕認可，而“影響因子”僅僅是期刊出版界基於傳播學和文獻計量學視角的一個參考指標。

當然，“以刊評文”、“以刊評人”格局的形成，也有學術共同體評價機制不夠成熟等原因。在某種意義上，學術大環境把學術期刊“推”到評價體系頂端的位置。但學術期刊人一定要有清醒認識，主動弱化、淡化期刊評價功能，全身心扶持原創作品、辦好期刊，提升期刊聲譽。而不是千方百計躋身評價體系，力爭充當學術裁判的角色。

近年，國家層面也對當前評價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糾偏，比如針對評價中過於看重論文等因素，連續出台了政策：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聯合發布《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同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自此，破“五唯”成為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破“五唯”如何落到實處？學術期刊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堅決反對論文“SCI、SSCI、CSSCI至上”等不良傾向，探索建立以內容質量評價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行業標準，堅持分類評價和多元評價，完善同行評價、定性評價，鼓勵實行論文代表作制度。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努力，改進完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改變虛浮的學風環境，進而以良好的期刊生態來進一步優化學術生態。

（四）實化“內容為王”，彰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內容為王”是指要把論文的內容質量放在最重要位置予以關注，也就是“高質量內涵式發展”。這是我國學術期刊多年以來的追求，也幾乎成為辦刊人的口頭禪。可以看到，近年，我國學術期刊管理部門及主辦者通過打造先進的管理流程，加強高效的數字化傳播手段，實施“走出去”戰略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期刊發展似乎還是形式大於內容，“虛”的成分偏多而“實”的內容偏少。以期刊“國際化”為例，雖然創辦了不少英文刊，但真正有影響力的還不多，這從

論文的發表越來越傾向於國外期刊可以看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21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科技論文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數量排名世界第2,高被引論文、熱點論文數量也保持世界排名第2位。另據統計,2010年中國學者在SSCI/SCIE期刊人均發文0.08篇,到2021年增加至0.22篇。2010~2021年,中國學者在SSCI/SCIE期刊中發表論文的比例由21%上升至61%。這些數字充分展現了我國學術期刊“走出去”、“國際化”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另一方面看,論文的“國際化”更加表明我國期刊的國際競爭力較弱,本土知識體系的自主性不強。

期刊質量提升是個系統工作,但在內容、形式、傳播等諸多要素中,內容是核心和根本。“內容為王”,本質上要求做大知識的增量。知識的增量包含了量與質兩個維度,亦即形式的規範化與內容的創新。內容的創新不易,也較難判斷,所以需要學術共同體前沿專家外審把關。一般學術期刊編輯實踐中,往往更加偏重關注論文格式、文獻引證的“規範性”,對此,筆者曾在一篇小文中加以批判,認為作為內容質量重要評判標準的學術性應當摒棄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八股”文風,不能簡單地認為題目好,文章就好;也不能以參考文獻都是本專業內的前沿論文就簡單地認為作者掌握了前沿動態、熟知了該領域等。評判一篇文章的好壞根本的還是內容是否有創新,或觀點新、或理論新、或方法新等,形式是否完美則是相對次要的因素了。^②

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經歷幾百年發展,形成了以方法上的實證主義、理論上的繼承性、取向上的獨立性為特徵的學術傳統。這種傳統積澱出與知識體系相適應的一整套“學科性”學術規範,而高等教育基本上也圍繞這套學術規範展開學術訓練,學術期刊選稿用稿自然也遵循這種規範。形式的規範化是實現知識增量的必要條件,也是保障手段。但如果把規範看得比創新還重,甚至推向極致,那麼就必然導向“學科性學術”排擠“問題性學術”,“精緻而平庸”的論文泛濫的期刊生態。張耀銘曾對期刊充斥大量的平庸之作作了批判,他指出:“學術平庸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低水平重複、膚淺分析和把學術變成‘娛樂至死’的舞台,其本質特徵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當下的學術期刊,平庸之作泛濫,帶給我們的常常是無聊或失望。所以我們應‘做有思想的學術,出有學術的思想’,不妨少發一些充滿‘犬儒主義’情節的文章,多發一些道義擔當和思想擔當的文章。”^③

這種種不良期刊生態的形成,根本上還是與我們沒有自主的知識體系、或者說與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已經斷層有關。“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體系是由基本問題、研究範式、概念命題、理論闡釋等構成的知識總體。長期以來,西方在探索現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知識體系,發生了深刻的知識變革,對西方現代化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但其中不少觀點論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將地方性知識‘普世化’,將現代化條件‘簡單化’,容易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現代化帶來觀念誤區。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要求建立能夠解釋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④

問題的關鍵在於,現代學科體系建立在西方知識體系的基礎之上。我國如何能夠突破西方知識體系?而陳文忠教授的一段話可能給我們以啟示:“在軸心時代的經典中,在諸子百家的典籍中,在歷代思想家的文集中,在浩如煙海的語錄筆記、文話曲話、詩話詞話中,現代人文學科的文、史、哲、經、政、法諸分支,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沒有未被前人思考過的。但是,仍有無數問題,或‘隱而未發’,或‘淺嘗輒止’,或‘充滿偏見’,或‘陳舊過時’。因此,我們必須試圖重新加以再思考,必須根據新的時代、新的語境、新的讀者需求,對‘老生常談’的經典問題和‘隱而未發’的學術課題,通過命題提煉、學理闡釋和拓展深化,不斷地加以創造性的重新再思考。”^⑤

期刊生態本質上是文化生態。創造性地重新再思考,就是要從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出發,秉持充分的文化自覺,樹立國際視野,堅定開放包容的中華文化自信,把握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特點,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和專業性,^⑭堅持理論創新,全面打造良好的中文學術期刊生態,進而構建起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為此,期刊人肩負時代使命,任重而道遠。

①《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北京:《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

②⑪劉仲翔:《走上第二個百年征程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2021年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盤點》,北京:《科技與出版》,2022年第3期。

③仲偉民、溫方方:《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社科期刊的外部壓力與內部應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④《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678、1488頁。

⑤蔡曙山:《認知科學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42頁。

⑥⑦王義梳:《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文明根基》,北京:《北京日報》,2022年6月6日。

⑧吳國盛:《科學的歷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第306頁。

⑨⑭劉芳:《學術期刊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陝西延安:《延安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⑩《訪談|朱劍:學術期刊是構建學術共同體的重要環節》,澎湃新聞,2018年9月6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848435635997495&wfr=spider&for=pc>。

⑫數據來源: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發布的相關數據統計得出。

⑬陳新華、胡宇晴等:《2008—2020年高校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數量變化趨勢及其原因分析》,北京:《科技與出版》,2021年第8期。

⑮李念:《王立勝:中國知識體系,現代化多源性中的中國實踐和理論》,上海:《文匯報》,2022年3月29日。

⑯何明:《“學科性學術”與“問題性學術”的張力及其消解——學術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與再建制化》,廣州:《開放時代》,2022年第1期。

⑰《從“學科性學術”到“問題性學術”(筆談)》編者按,廣州:《開放時代》,2022年第1期。

⑱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關於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北京:《中國出版》,2021年第14期。

⑲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⑳秦開鳳:《學術性:學術評價的“第一道關”》,上海:《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26日。

㉑張耀銘:《學術評價亂象與學術期刊自律》,吉林延邊:《延邊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

㉒項久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創造》,北京:《光明日報》,2022年8月24日。

㉓陳文忠:《論人文學科的學術提問》,安徽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㉔《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347頁。

作者簡介:秦開鳳,陝西省社會科學院《人文雜誌》主編,研究員,博士。西安 710065

[責任編輯 劉澤生]